

**编者按：**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成果专栏本期推介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成果。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于2022年3月批准设立。实验室依托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整合中山大学地理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科研力量，构建了高层次、跨学科、专业化的科研团队，形成了完善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机制，坚持面向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探索有关大湾区人文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基础研究与决策咨询并重发展、学科发展与智库建设相互融合为原则，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自然、人与经济四大重点领域，开展高层次的创新科学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致力于服务国家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本期刊登的是《香港乡村文旅发展与共同体意识建构路径研究》。本专栏将持续聚焦实验室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果，敬请关注。

# 香港乡村文旅发展与共同体意识 建构路径研究\*

罗意林 孙伊婧 孙九霞

**[摘要]**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不仅是推进香港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也是增强香港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乡村作为同时承载着内地历史与香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缓解港人“认同焦虑”、构建大湾区人文共同体的关键。与此同时，发展文化旅游是破解当前香港乡村振兴人才支持不足、产业基础薄弱、政策落实困难、与内地交流不充分等痛点难点的有效推力。为此，要以大湾区文旅共建为引领，推动香港乡村历史挖掘，引导香港重塑乡村文化吸引力，探索政策同享有效路径，推动香港乡村旅游从“城市依附型旅游”向“文化驱动型旅游”转型，成为深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场域。

**[关键词]**身份认同 共同体意识 乡村文旅发展 香港

**[中图分类号]** G127；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461(2025)09-020-12

##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方针的深入实施为香港繁荣稳定筑牢了制度根基，但香港社会在

---

\* 作者简介：罗意林，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伊婧，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广东省“百千万工程”专家智库首批专家委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大湾区人文共同体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要素流动体制机制研究”（GD24ESQ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ZD190）。

国家身份认同上仍需强化。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的遗留问题与西方意识形态长期渗透，致使部分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感较为淡薄；另一方面，文化“融湾”与政策同惠的力度不足，阻碍了大湾区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协同发展。此外，伴随着“全球－国家－地方”互动框架下地域竞争力和资本流动网络的发展，香港的经济地位受到影响（占玮等，2025），香港同胞心态需要调适，家国认同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凝聚更大共识。

调研发现，香港乡村作为港人本土性的重要根基与象征，是桥接香港居民文化认同与社会联系的关键纽带。乡村不仅是香港社会发展的起点，更承载着香港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然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香港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乡村的经济地位逐渐边缘化，乡村文化面临着被遗忘、被消解的风险，其物质载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双重流失危机。这种文化断裂不仅割裂了代际传承（杨晗旭和徐海波，2016），更削弱了本土性与国家性的联结纽带。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将香港定位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特区政府制定“十年文化艺术设施发展蓝图”并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香港社会迎来文化治理的战略转型机遇。在此背景下，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不仅能为香港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还能通过文化传承与交流，增强香港同胞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从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身份认同理论为支撑这一路径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基础。研究者强调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或价值的归属，故而共建人文湾区的关键在于通过交往实践稳固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再生产（任珺，2023）。既有研究对香港同胞身份认同进行了二维与三维分析框架的学理探讨。其中二维研究范式聚焦本土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辩证关系，揭示出结构性张力与动态平衡机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本土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双重属性，两者既矛盾又统一（辉明和徐海波，2016）。杨晗旭与徐海波（2016）援引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詹姆逊后工业时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善恶观，指出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将内地描述为“恶之他者”，抽象的西方民主意识形态取代了爱国主义，国家认同被解构，与香港的本土意识对立起来，导致青年群体出现国家认同解构与本土意识强化的背反现象。这种认同危机在有关实证研究中得到佐证（魏南枝，2018）；冯庆想（2020）直接指出近年来部分香港青年强烈的本土意识与较弱的国家认同形成较大反差。与之相对，三维分析框架则系统性分析身份认同的多维构成，强调经济理性、文化情感与政治价值的交互作用。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居民不仅触及“公民身份”的问题，更触及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问题。而正是在文化和政治认同的问题上，香港展现出其特别复杂的一面（强世功，2010）。学者普遍认为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双重性，即香港人对于政权意义以及文化/族群意义上的“中国”在认同上存在差异；二是功利性，即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更多地受到工具主义思维的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经济层面的影响突出（郝诗楠，2019）。经济、民生、政策因素对香港居民国家认同的影响体现为贸易发展、房地产价格与香港居民国家认同呈现正相关，本地生产总值变动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与香港居民国家认同呈现负相关（冯庆想等，2019）。也有学者将部分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分化与偏离归因其政治价值观（杨红柳和钟明华，2017）。既有研究揭示，香港居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体现为本土意识与国家认同的结构性张力，其背反现象根植于历史遗留、政治价值分化及经济工具理性的交互作用，需通过多维框架整合文化情感与制度实践以实现动态调适。

为探索乡村振兴的区域实践，深入认识香港社会的认同现状，本研究团队先后多次在广东、香港等多地开展实地调研，并组织粤港研讨交流会。调研发现，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和区域政策，开展了系列乡村保育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2020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人文湾区与休闲湾区建设初见成效，到2035年全面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2024年9月，广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强调要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动旅游业全面提质升级。香港乡村作为有别于一般香港居民的非均质化认同生产场域，其文化旅游开发实质是本土记忆再生产与国家认同重构的辩证过程，因此，探究乡村文化旅游是破解香港居民身份认同困境、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文化治理实践创新的重要切口。然而，目前香港乡村发展面临着人才引进不足、产业基础薄弱、资金援助有限、政策落实缓慢以及与内地交流欠缺等痛点难点，制约着乡村及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产业的联动优势，助力香港乡村振兴实践。

本文基于“认同重构—文化再生—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从学术层面探索乡村场域如何通过文化实践实现“本土性保留”与“国家性重塑”的辩证统一，致力于为“一国两制”视域下的湾区治理提供学理参照；在实践层面，提出依托大湾区大旅游格局支持香港乡村发展，理顺其本土文化脉络，强化区域人文联系，促进香港从“城市旅游”向“文化旅游”形象转型，进而推动香港乡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阵地和教育阵地。

## 二、香港同胞“认同焦虑”的现实困局

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复杂且动态演变的过程，其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普遍认为，“香港人”作为一个身份建构，发端于港英政府统治时期（郭艳和徐博东，2008）。港英政府对香港社会地域性身份认同的有意形塑，加之“港二代”的出生，推动了“香港意识”的萌发滋长；回归之后，“一国两制”政策施行、北京奥运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等重大历史事件，持续塑造着港人身份认同的阶段性变迁（田飞龙，2022；郝诗楠，2019）。当前，随着内地与香港在金融、旅游、电信、建筑等领域的合作共商以及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日益深化，“香港意识”等本土话语在国家认同形塑过程中愈加鲜明，香港社会的身份认同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 （一）香港身份意识二元分化，本土话语争夺激烈

当前香港社会对本土的认同渴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态势，但这一认同结构受到多种力量影响，涵盖制度比较、文化重构、身份政治等维度，形成三重张力，即制度本土性的全球话语权争夺、文化本土性的国家整合诉求、身份本土性的地方主义表达。

在制度层面，西方敌对势力持续推动所谓的“制度本土性”认同方向，试图分裂香港与社会主义中国整体认同之间的联系。从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制度离间，到回归后西方政治和媒体的长期干预，西方敌对势力均有意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此制造本土认同与中华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对立。研究显示，在香港修例风波出现后，《纽约时报》在 Twitter 上的涉港报道中出现大量社交机器人，其评论多支持抗议者立场，强化了西方媒体主导的叙事框架（师文和陈昌凤，2020）。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以所谓“不确定性”等理由搬离香港，但对香港的负面报道从未停止。2024 年以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媒体就因标题断章取义、内容失实等问题，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批驳和谴责。还有研究指出，2021 年后西方媒体对香港议题焦点逐渐从对香港法治与治理的诬蔑，转向渲染“人权危机”和“经济下行”（林功成等，2025），意图削弱香港民众对国家的制度信任与情感认同。

在文化层面，内地强调香港的文化本土性，强化内地与香港的互动关系。内地主流媒体强调香港不是独立历史文化单元，而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其脉络与广东等地一脉相承。《光明日报》、求是网、人民网等均发表文章指出，香港文化之根基深植于中华文明，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相关文化节目与系列活动不断强化这一论述，例如 2018 年由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国际合作司、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特别指导，湖南广电联合香港 TVB 出品的音乐原创节目《声生不息·港乐季》，在回溯港乐发展史时，明确指出港乐的起源与岭南文化密切相关。同时，香港在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地位转变也影响其文化身份的再建构。

在身份政治方面，香港社会内部的身份本土性话语因缺乏统一叙事而呈现出分化状态。黎沛文等（2022）指出，香港本土意识经历了从“初步建构”到“政治觉醒”，再到“异化”转向。特别是 2010 年之后，香港本土意识被激进右翼民粹力量骑劫，逐渐与分离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排内”等倾向。如今，本土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着当代香港民众。Carolyn Cartier（2008）曾指出，香港青年尤其“00 后”一代更习惯于从本地语境中寻求身份认同。尽管本土自觉原应成为港人国家认同的基础，但在“港独”猖獗、外部势力干预、潜逃海外的反中乱港分子的影响等背景下，港人国家认同的建构和方向发生了偏移，一系列极端违法暴力行径，展现出本土分离主义的介入，推动香港认同进一步走向异化。

综上，香港民众并非普遍主动割裂本土与国家的双重话语，但内部认同的对抗与分裂确实阻碍了国家认同的建构。当前缓解港人“认同焦虑症”、重塑中华民族的整体认识，既是当务之急，也为粤港澳大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问题导向和现实契机。

## （二）认同教育成效尚待提升，爱国主义教育仍需强化

部分香港民众在国家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长期存在认知偏差，这与香港受殖民统治历史密切相关，当前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的建构面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沈本秋（2016）指出，殖民统治时期港英政府的教育措施留下了两大遗产，一是强化了实用主义，二是削弱了国家意识。香港当代社会的认知偏见集中表现为对制度的误读和分歧，部分港媒过分推崇西方政治制度，曲解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并选择性地解读和批评，认为香港政治变革应以西方政治体制为必然方向。在此背景下，偏颇的“民主”“法治”等话语被塑造为“文明意识”的象征，强化了香港部分群体的“本地优越感”以及对内地居民的排斥态度。香港的国民教育也相对滞后，导致在引导香港青年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价值观方面存在不足（曾志敏和宁悦，2020）。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及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改革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已陆续采取多项措施以加强国家认同教育。例如，将中国历史纳入初中阶段的独立必修科目，启动“姊妹学校”计划，并规划设计覆盖内地多个省市的研学路线。通过加强教师培训、国情学习和推行多元学习体验等措施，培养同学正确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念，具体措施如：举办教师内地考察、到校国安教育教师深化课程，定期提供国史国情教学资源，每年对至少 50 所学校进行国民教育重点视学，在小学阶段开设人文学科课程，以及举办形式多样的中华文化体验活动等。<sup>①</sup>然而，香港爱国主义教育仍面临三方面阻碍。一是在教材、教师的管理问题上依然有待实现全面优化。内地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尚未充分在香港本地化，难以很好地直接应用于香港的教育环境，部分教师对待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会采取被动敷衍的态度。二是西方媒体强调国家教育政策对香港“本土意识”的所谓“侵蚀”，渲染了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有意误导受众认为香港教育正受到所谓的“政治化”影响（林功成等，2025）。三是内地文化对香港青年而言存在距离感。章宏和王潇（2024）研究发现：香港青年在接触内地电视节目时，相较于澳门青年表现出更多的疏离感和批判性，较少将内地文化纳入他们的日常生活语言之中。杨红柳和钟明华（2017）通过分析指出，部分香港青年将国民教育视为一种“灌输”和“洗脑”方式，与所谓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相悖。截至 2024 年，本团队实地调研发现，部分香港青年学生对爱国主义教育仍显淡漠，接受程度有待提高。

诚然，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健康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转变香港青年学习的客位视角，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是促进香港社会文化与心理变革的关键所在，但仍需要付出长时段探索与多路径实践。为此，立足香港社会的独特性，开展符合香港实际的教育工作，以乡村文化链接香港本土性与中华历史根脉，是拉近爱国主义教育与健康青年距离感的重要抓手，是爱国爱港教育有机结合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 （三）游客对香港消费兴趣渐退，对香港社会经济认同减弱

目前，香港经济的四大产业支撑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工商业支援服务。2024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2.5%，<sup>②</sup>主要由外向型经济驱动。以旅游业为例，2024 年内访港旅客占全年访港旅客量约四分之三，<sup>③</sup>内地依然是香港的最重要客源地。但受产业升级乏力、好客度不高等因素影响，香港对内地旅客的目的地吸引力日渐下降，不利于形成经济、文化、社会多维互嵌式的社会结构。

当前内地旅客对于赴港旅游呈现出“四不”状况。其一，“不愿去”。香港旅发局的数据显示，2024 全年访港旅客总数为 4450 万人次，仅相当于 2018 年的 68%。其二，“不消费”。2024 年香港零售业连续 10 个月下滑，全年总销货价值跌幅 7.3%，<sup>④</sup>包括百货公司、珠宝首饰、钟表及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 2023 年施政报告》，2023 年 10 月，<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3/tc/p30.html>。

<sup>②</sup>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sup>③</sup> 香港旅业网：《旅发局公布 2024 全年共录得近 4,500 万旅客人次访港 东南亚市场表现强劲 长途市场旅客量按年增 5 成 过夜旅客占一半 旅客访港满意度高》，2025 年 1 月 15 日，[https://partnet.hk/tb.com/china/sc/industry\\_news/hktb\\_updates/index.html?id=7507](https://partnet.hk/tb.com/china/sc/industry_news/hktb_updates/index.html?id=7507)。

<sup>④</sup>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名贵礼物等，香港作为“购物之都”的地位正受到挑战。一方面，内地消费市场的升级和免税政策的完善，使得香港的购物优势不再明显；另一方面，香港本地高物价、服务意识不足等问题也导致内地游客消费意愿下降。其三，“不住宿”。随着交通发展，前往香港的内地过夜游客数量锐减。即便酒店频繁推出免费多住一晚、精选健康体验等优惠措施，2024年香港酒店房间入住率为85%，仍低于2018年的91%。<sup>①</sup>其四，“不满意”。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访港澳内地游客满意度调查显示，香港从2017年“内地出境游客最满意目的地”榜首跌落到2024年第一季度的榜七；相比之下，澳门超越香港，成为内地游客出境旅行的首选。

旅游作为连接香港与内地的重要纽带，其发展变迁不仅反映了两地交往的紧密程度，也成为香港经济整体发展态势中的一个显性表征。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干扰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向，美国受通胀压力影响或将放缓减息步伐，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信心。在此背景下，西方舆论持续对香港进行负面报道，通过制造“外资撤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保”等论调冲击港人的经济信心和认同（唐嘉仪和王童辰，2024）。与此同时，香港本地居民的消费行为出现变化，“北上消费”成为常态，“香港挣钱，深圳花”成为新生活方式，甚至出现由“港车北上”政策引发的跨境消费热潮。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2024年全年经深圳各类口岸入境的香港居民超7700万人次，内地居民出境前往香港超3800万人次。<sup>②</sup>经济形势与社会心态双重转型的当下，香港亟须以新的手段加强与内地的紧密联系，重新塑造区域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战略地位，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 三、香港乡村社会脉络与发展状况

近年来，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香港的乡村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乡村振兴不仅是香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重塑港人文化认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香港乡村作为当地居民文化与社会联系的根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在现代化浪潮下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

#### （一）香港乡村承载本土身份认同，是港人文化与社会联系的根基

乡村在香港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空间，而且记录了香港的自然景观和乡土风情的变迁，承载着本地居民的集体记忆、情感依恋和身份认同。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景观，为港人提供了寻找精神寄托和文化根源的重要场所，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文化多样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构成了香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支点。香港开埠之前已有大量村落分布。在20世纪中叶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乡村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提供住房空间等方面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例如，香港仔、鸭脷洲、赤柱等地，均展现了传统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区的独

<sup>①</sup>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sup>②</sup> 杨阳腾：《2024年经深圳口岸入境的香港居民超7700万人次——深港交融带火跨境消费》，《经济日报》，2025年2月10日。

特经验。同时，以荔枝窝为代表的远郊村落在早期为香港市区提供了劳动力和资源补给，但随着人口外流和功能弱化，远郊乡村陷入空心化乃至完全衰落的困境。这种城乡互动关系深刻塑造了香港当代的城市空间格局和社会结构基础。

在社会文化方面，乡村作为港人社会联系的根基，维系着基本道德和文化规范。香港原住民多以村落宗族为核心集聚，形成聚落。例如，新界五大氏族——邓氏、文氏、侯氏、廖氏和彭氏，早在宋朝就已定居，并在元朗等地广建宗祠、书院和集市，构成了香港乡村宗族文化的基本单元。传统的祠堂、节日、仪式、祭祀等社区公共活动，使得香港本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得以保留和延续。例如，近年来荔枝窝村通过复耕计划与民宿开发，不仅实现经济活化，更强化了文化传承，形成“活化利用—文化认同”的良性循环。

更重要的是，乡村历史是塑造香港居民“家国认同”的重要依托。一方面，乡村积淀着抗英、抗日等民族抵抗历史，具有独特的国家记忆价值。调研发现，林村乡、沙头角等地的乡村在历史上曾多次组织抵抗外敌入侵，这些抗争历史成为港人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素材。另一方面，乡村保留的客家文化、宗族文化和农耕文化等文脉，也成为港人与内地文化连接的纽带。例如，荔枝窝村的客家文化、宗族文化和农耕文化，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也有利于重建香港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路径，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塑造港人的本土身份和社会认同奠定了根基。

## （二）香港乡村历史有助于强化中华文化叙事，消解殖民史观

香港乡村的悠久历史超越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所建立的文化和历史叙事框架，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香港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始于宋朝，当时许多中原人因躲避战乱南迁至香港新界地区。新界原住民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公元960年至1127年），早期居民主要生活在西北沿海的元朗八乡、屏山、沙田等区域（Lo C. P., 1968），这些地区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村落格局与宗族体系。例如，吉庆围已有500多年的历史，荔枝窝于300年前落成，都展示了香港居民悠久的生活脉络和自我防御体系，反映了香港与内地相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根基。因此，香港乡村一直以来呈现出独立性与本土性。一方面，乡村的居民以宗族为核心集聚，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结构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乡村地区的教育和文化遗产并未被殖民文化所取代，如新界地区在晚清民初时期，许多文人在乡村办学教学，传授传统文化。尽管英国殖民统治者试图通过经济和文化上的控制来改变香港的社会结构，但许多围村和渔村依旧保持着与殖民统治者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体系，特别是在语言、宗教、习俗、节庆等方面，展示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当前，香港乡村作为中华文化的活态传承空间，其文化根系在历史地理维度具有可考据的延续性。新界乡村客家、疍家、鹤佬等三类族群皆能够追溯其内地祖籍，多源自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区；林村乡村民就自称是“来自河南的客家人”。在此基础上，乡村的节庆活动和传统习俗依然延续着对祖先的尊崇和对传统仪式的赓续。如上水廖族的春祭仪式，依照传承已久的古制进行，通常在农历二月初二于其祖祠廖万石堂举行，该建筑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香港龙舟赛等节庆活动中依然延续着一系列传统仪式，强调节庆活动不仅是娱乐和竞技，更是对祖先智慧和努力的致敬。此外，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不断完善，非遗的挖掘和保护意识日渐增强，这反映出官方与民间对传统文化保护从观念到行动的共同重视。截至2025年，香港共有

507项非遗项目立案，其中多项与乡村文化相关，如大澳端午龙舟游涌、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八乡莲花地村点灯、沙田石古垄村点灯等。这些文化传承不仅为香港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强化港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土壤。

### （三）香港乡村振兴政策支持不足，文化旅游有望成为主要推力

尽管香港乡村地广且村庄数量不少，但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香港的乡村地区出现了经济与人口发展上的退化，陷入发展瓶颈状态。

首先，乡村人口流失严重，人才支持不足。许多年轻人选择到香港市区或海外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乡村老龄化问题严重，远郊村更是荒废和闲置。整体来看，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公布的《2023年人力推算报告》预测，至2028年香港人力短缺将达18万人，香港的劳动力缺口巨大的背景下乡村人口和振兴人才将更加匮乏。

其次，乡村产业经济衰退，原生韧性缺失。在自然灾害频发、外来产品冲击、劳动力缺失的背景下，香港乡村的农业发展受限。传统农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衰弱，尽管有大规模批量化的集约型农业替代，但也主要集中于靠近中心城区的乡村。而滨海地区的渔业和盐业发展也因遭遇环境污染等问题而逐渐衰弱（李晨曦和何深静，2019）。

再次，乡村振兴政策措施落地困难，基层组织能力较弱。李晨曦与何深静（2019）指出，香港的乡村发展缺乏政府层面的系统保护措施和制度设计，政府管制系统碎片化，管理职能过于分散，部门之间缺乏协调，而民间自发组织的保护行动常因规划协调不当或资金不足而搁浅。实地调研发现香港林村乡乡村建设资金申请受到多方力量影响，迟迟得不到批复。

最后，香港与内地的区域协同不足，政策衔接困难。内地在乡村振兴方面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对此香港乡村居民多有了解。调研中新界村民强烈反映，渴望能与内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政策同惠。然而，由于香港在土地政策、环保标准等方面与内地存在差异，加上部分环保主义者反对乡村开发，乡村振兴的推进受到制约。

在此背景下，文化旅游有望成为香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力。如荔枝窝通过复耕项目、民宿开发以及文化活动的举办，成功吸引了游客，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的获得者。此外，南丫岛和大澳渔村等地凭借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节庆活动，如长洲太平清醮、大澳龙舟赛等，成为香港乡村旅游的亮点。这些成功案例表明，文化旅游不仅能为乡村带来经济收益，还能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是香港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 （四）香港乡村资源本底良好，开发潜力大

作为紧密型城乡关系的典型城市，香港在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方面具备融合优势，为多元主体共建乡村提供了良好平台（胡一诺，2024）。推动文化旅游转型升级，不仅有助于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也为香港探索城市与乡村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契机。在此过程中，香港可借鉴内地的成功经验，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推动乡村旅游繁荣发展。香港的乡村文化旅游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首先，香港的乡村文化保育机制较为完善，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新界乡议局、乡郊基金、赛马会等组织机构积极推动乡村文化活动。例如新界的上水文氏宗祠、大埔林村的天后庙等重建项目，不仅为原居民提供了文化认同场所，还成为游客体验香港本土文化的重要

景点。近年来香港也涌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实践案例，其中荔枝窝村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其振兴方式也已开始在邻近村实践，未来有潜力在更大的片区推广。

其次，香港乡村的旅游资源禀赋优越，既包括独特的自然景观，也涵盖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自然环境方面，香港拥有多样的地形地貌，包括山脉、海岸线、湿地和自然保护区。例如，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屿，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是游客体验自然风光和户外活动的理想之地；南丫岛和大澳渔村等地也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和生态资源闻名。在历史文化方面，传统村落如大澳村、西贡村等仍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旧时建筑风格，延续着许多传统习俗和节庆活动。大澳村以其独特的水上棚屋和传统渔村文化而闻名，成为游客体验香港传统文化的重要旅游地。长洲太平清醮、大澳龙舟赛等传统节庆活动，也是香港独具一格的特色文旅资源。

再次，香港乡村旅游发展环境优良，具备良好市场基础政策环境也在改善优化。一方面，随着游客对自然和宁静生活的需求增加，乡村旅游成为热门选择，家庭游客、研学者和摄影爱好者是主要消费群体。另一方面，特区政府日益重视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多项政策支持乡村旅游业，基础设施也日渐完善。当前，香港特区政府通过推进乡村振兴，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并提供财政补贴，进一步推动了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 四、以文化旅游推动香港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路径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不仅是推动香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更是重塑港人身份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举措。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香港乡村作为香港人本土性认同的重要根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是连接香港与内地的重要文化纽带。然而，当前香港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以文化旅游推动香港乡村振兴促进港人国家认同的具体路径。

##### （一）以大湾区文旅共建推动香港乡村历史挖掘，促进香港乡村本土性复兴

建议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联动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及爱国主义教育小组，协同大湾区高校、文化协会等多元主体，系统开展香港乡村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活化工作。通过建立大湾区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联合广东省相关部门，强化文化资源深度整合，系统构建涵盖宗族源流、节庆传统、历史沿革的数字化档案体系，实现乡村文化脉络的可视化追溯。

在此基础上，推动香港城乡文化互动项目落地，联合广东省文化团体与香港相关部门举办城乡创意集市、文化展览及假日志愿活动，建设城乡共享公共空间。针对青年群体，依托大湾区教育资源优势，由特区政府教育局牵头开发乡土研学课程体系，编撰乡土教材，设置场景式、体验式的课程教学，组织学生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采集等方式参与本土乡村文化建档工作与文化传承，培育本土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

同时，鼓励相关团体与香港乡村本土力量联合打造香港乡村创意休闲空间。如发挥大湾区创意经济资源优势，鼓励广东省文化艺术行业协会、香港美协、香港作家联会等湾区各界文化艺术团体创建文化部落，吸引青年人才成为乡村传统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力量，也为香港市民创造丰富的文化休闲空间。支持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香港客属总会、香港新界乡村联盟等相关团体通

过旅游发展推动香港乡村文化传承。设立乡村文化传承点，如传统手工艺工作坊、民俗节庆展示馆、乡土餐饮等，通过旅游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关注香港乡村文化，培养乡村文化传承人。

（二）引导香港乡村重塑文化旅游吸引力，实现“从国家看香港”与“从香港看国家”的双向建构

引导香港乡村旅游发展与国家政策对接。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进一步推动香港乡村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拓展历史文化旅游，学习“两山”理念发展生态旅游；同时发挥香港“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服务平台角色，将香港乡村旅游发展纳入“一带一路”文化走廊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乡村文化旅游体验。

在粤港澳大湾区联合打造区域性的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将香港乡村旅游发展纳入大湾区发展规划，通过跨境合作，依托地缘、亲缘整合大湾区乡村文化、历史和生态资源，以“溯源”“引流”的思路重点打造粤港澳旅游系列品牌产品，如联合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文化体验月”、区域龙舟赛等节庆活动、粤港澳饮食和中医药等文化交流展会，进一步吸引境内外游客参与。

推动大湾区文旅建设有关团体力量，进行地方文化吸引物的协同塑造。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以新界、南丫岛、大澳等地具有代表性的乡村为基础，梳理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和文化习俗，形成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地图、乡村历史走廊，打造各具主题特色的乡村。

依托香港的区位优势，建议创建“香港国际乡村旅游示范村”，形成若干具有标志性的香港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依托乡村文化推动香港旅游业从城市旅游向文化旅游转型，汇聚多方合力，支持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带头打造香港本土乡村旅游品牌。同时，在旅游信息平台、官网以及 TikTok、Instagram、YouTube 等新媒体平台推介。

（三）积极推动以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政策同惠试点建设，彰显国家制度优越性

在乡村振兴政策层面，建议采用“国家政策引领，广东示范性支持”模式，推动内地相关政策惠及香港乡村。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政策，将国家乡村振兴的资源和制度优势辐射至香港农村地区，弥补其长期发展资源不足的问题。在民生层面，有针对性地发放乡村振兴补助，培育乡村产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让香港居民切实感受到国家制度优越性和普惠性。

推动乡村旅游区域联动发展。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平台，引导香港同全国乡村旅游发展工作充分交流。在香港引入内地成功的乡村旅游建设模式，同时将香港乡村旅游开发案例作为全国典型推广，实现全国乡村振兴资源与经验共享。推动香港与深圳联合制订乡村振兴计划，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资源，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旅游发展协作基地”等协作平台，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的自由高效流动。

鼓励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与相关协会组织开展“内地－香港”乡村旅游合作推广。组织湾区青年交流沙龙，邀请香港青年前往内地进行乡村旅游学习考察，同时邀请内地专家和青年赴港交流，通过双向交流增强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和认同。引导内地与香港的乡村振兴有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鼓励大湾区企业共同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如农业科技研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乡村艺术工坊等，实现香港乡村企业与内地企业共享市场信息、技术资源和管理经验。

## 五、结语

香港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是实现香港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更是增强香港居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实践。本文研究表明，香港乡村作为香港居民本土性认同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是连接香港与内地的文化纽带。然而，当前香港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限制因素，如专业人才短缺、政策执行效率不足、与内地协同机制不健全等，这不仅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香港居民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框架下，香港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广东省可在政策协调、资源配置和市场拓展方面提供支持，推动香港乡村文化旅游的深入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乡村旅游品牌、推进青年研学教育、试点政策协同机制等举措，香港乡村文化旅游有望完成从“城市依附型旅游”向“文化驱动型旅游”的转型，并成为深化国家认同的文化场域。

总体来看，文化旅游不仅是香港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更是重塑身份认同、促进粤港澳区域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香港乡村文化旅游有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生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支点。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香港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将进一步增强本地文化主体性，深化香港居民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强化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制度性与情感性联结，并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建设进程中，发挥“城市—乡村—文化—旅游”多维融合的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冯庆想,2020:《香港本土意识与青年国家认同——基于内地与港澳学界的文献分析》,《青年学报》第1期。
- 冯庆想、赖付军、徐海波,2019:《经济、民生、政策对香港居民国家认同的影响——基于回归模型的分析》,《系统科学学报》第4期。
- 郭艳、徐博东,2008:《回归前后香港同胞“国家认同”的变迁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辉明、徐海波,2016:《香港人双重身份认同评析》,《岭南学刊》第2期。
- 郝诗楠,2019:《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展望:基于港台海外学术成果的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胡一诺,2024:《多元主体共建的大都市远郊乡村振兴路径探索——以香港荔枝窝村为例》,《国际城市规划》(网络首发)。
- 李晨曦、何深静,2019:《后生产主义视角下的香港乡村复兴研究》,《南方建筑》第6期。
- 林功成、谷端为、李莹,2025:《〈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西方媒体涉港报道的话语建构与策略转向》,《统一战线学研究》第2期。
- 黎沛文、郑媛文、谭尹豪等,2022:《香港本土主义与国家认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强世功,2010:《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变迁与价值认同变迁》,《文化纵横》第6期。
- 任珺,2023:《基于身份认同的人文湾区建设路径探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沈本秋,2016:《观念挑战与制度短缺:港人的国家认同建构之困——以香港国民教育问题为例》,《科学社

会主义》第 5 期。

师文、陈昌凤, 2020 :《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基于〈纽约时报〉“修例”风波报道在 Twitter 上扩散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 5 期。

田飞龙, 2022 :《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青年探索》第 4 期。

唐嘉仪、王童辰, 2024 :《构建全球认知 : 香港“科技安全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港澳研究》第 2 期。

魏南枝, 2018 :《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与走向》,《中国青年研究》第 5 期。

杨晗旭、徐海波, 2016 :《“他者即恶”——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与国家认同的流变》,《中国青年研究》第 2 期。

杨红柳、钟明华, 2017 :《从歧见到共识 : 香港青年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价值观探析》,《学习与探索》第 7 期。

章宏、王潇, 2024 :《诠释社群、群际接触与桥接实践 : 一项基于跨地域电视节目接受的比较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第 9 期。

占玮、袁奇峰、卢俊文, 2025 :《“珠江模式”的转型 :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空间化的结构过程》,《城市规划学刊》第 1 期。

曾志敏、宁悦, 2020 :《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 : 演变历程与建构路径》,《青年探索》第 1 期。

Carolyn C., 2008, “Culture and the City: Hong Kong, 1997–2007” , *China Review*, 8(1), 59–83.

Lo C. P., 1968, “Chang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the Hong Kong new territories”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8(2), 273–284.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 Hong Ko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SUN Yijing LUO Yilin SUN Jiuxia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s not only a key pathway to revitalizing Hong Kong’s countryside, but also a vital practice for strengthening local resi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shared repository of mainland history and Hong Kong heritage, rural villages can mitigate Hongkongers’ “identity anxiety” and anchor a humanistic communit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Simultaneously, cultural tourism offers a powerful lever for overcoming today’s bottlenecks—insufficient talent,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s, policy-implementation gaps, and limited interchange with the mainland. Guided by GBA-wide tourism collaboration, Hong Kong must excavate its rural past, rekindle the cultural appeal of its villages, and pilo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allow mutual policy benefits. Transforming Hong Kong’s rural tourism from “urban-dependent” to “culture-driven” will turn these villages into critical sites for deepening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 Identity;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Rural Cultural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Hong Kong

【责任编辑 : 何满雄】